

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自然科学中的 哲学问题

张卓民 著

张卓民文集

张卓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自然科学中的 哲学问题

张卓民 著

张卓民文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张卓民文集/张卓民著.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9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ISBN 978-7-5097-3701-9

I. ①自… II. ①张… III. ①哲学-文集②自然辩证法-文集③选择学-文集 IV. ①B-53②C93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2465 号

·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 ·

自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 · 张卓民文集

著 者 / 张卓民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皮书出版中心 (010) 59367127

责任编辑 / 张丽丽 丁 凡

电子信箱 / pishubu@ssap.cn

责任校对 / 杜绪林

项目统筹 / 邓泳红 丁 凡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28.25

版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 / 475 千字

印 次 /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3701-9

定 价 / 128.00 元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编委会

主 任 鲍振东

副主任 曹晓峰 孙洪敏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凯旋 卢 骅 吕 超 孙 航 牟 岱 李志国

李劲为 宋 扬 张天维 张洪军 张献和 陈 萍

陈 爽 金 哲 梁启东 廖晓晴 薛 勤

作者简介

张卓民，吉林长春人，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曾任辽宁社会科学院院务咨询委员、自然辩证法与科技发展研究所所长、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院务咨询委员会主任、辽宁社会学学会副会长、辽宁省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副理事长等。主要研究专业 and 方向：科学哲学、社会学。主要学术研



究成果有：《科学与认识论》《夸克禁闭与物质无限可分》《系统论几个哲学问题》《科学方法论丛书》《一般选择学》《改革开放 20 年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在变革中崛起——辽宁改革发展实践的理性思考》《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营口卷》《2006 年：中国东北地区发展报告》《历史性巨变——解读辽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解读“营口模式”》等。

总 序

时值壬辰，辽宁社会科学院走过了波澜壮阔的五十年征程。经过精心策划和编排，“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终呈其面，令人欣喜，从中不难窥见中国学术传统的映像和传承，感知社会科学工作者栉风沐雨、砥砺研磨的艰辛劳苦，雄立潮头、凯歌行进的激情与欢乐。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于人类的生存发展意义重大。自有人类社会起，就开始了各种方式的对社会规律的探索，以叩问社会之道，寻求社会的良性发展。这些探索已成为人类探索自身的一部分。社会是人的活动域，有关这一场域的属性、构造、关系、机能等的规律性的研讨构成了社会科学的内容。康德生动、精准而有趣地表述了自然、人、社会的关联：“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起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人类结成社会以解决来自大自然的威胁，或者说人类以社会的方式告别了自己的自然之属。从那一刻起，社会就作为人的结构的一部分而存在，它和人的关系是那样的密切，以至于建设社会就是建设人自身，研究社会就是研究人自己，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寄托着人类的希望。一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社会关联着人类的未来，在马克思的理想中，“人的社会”将“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理想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党宣言》）；社会“创造着具有人的本质的这种全部丰富性的人，创造着具有丰富的全面而深刻的感觉的人作为这个社会的恒久的现实”（《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对人类未来的期许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充类至尽的学术积淀，成就了社会科学研究事业的光昌流丽、兴旺发达。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有着不可忽视的学理传统，即要着眼于基础理论的



研究。人类社会代有其变，但有着基本的规律贯穿其间，对这些基本规律的研究延续在数千年来对人类社会的体认之中，其成果构成了社会科学理论的深厚传统，凝聚为人类文明的珍贵积淀，影响着各个时代、各种体制下的社会建设。“天有显道，厥类惟彰”（《周书·泰誓》）。这是社会科学发展的普世追求。分门别类，彰显根本，对社会之道的追问是社会科学工作者的职责；对人类文明成果的积淀与守护，探索人类社会的运行法则和进步理念，是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社会科学研究事业是与时俱进的，这是它的时代性，它由此建立起有差异的合法性、权威性，建立起与所处时代的血脉关联，并以此回应时代之问。时代精神赋予了哲学社会科学分析现实的视角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它必须与时代一同发展，葆有向新而去的敏锐性、先锋性，敏锐地在学理传统中整合进时代的质素，以此推进社会的积极发展。对于当下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而言，要处理好八种关系，即学术与政治的关系、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求真与务实的关系、动机与效果的关系、调查与研究的关系、科研与科普的关系、有为与有位的关系、治学与修身的关系，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伟大历史进程中，做好本职工作，积极推进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

社会科学研究又是一项脚踏实地的事业，它的理论不是面向空中筑楼阁，而是朝向坚实大地的实践结晶，呈具象于大地上繁衍生息的各个人类共同体之中，与具体的生活、建设、发展相联结。它的应用性体现在作为社会管理、政策制定的智库，为具体的社会发展服务。由此，社会科学研究要继续“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光荣传统。事实上，倡导调查研究是现代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固有的学术传统，早在 20 世纪初，中国大地上开展的一系列社会调查孕育了现代形态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事业，其卓越的成果不仅构架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基架，而且为中国社会的大变革提供了学理上的合法性依据。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也必须在调查研究中切实致力于发现、认识并解决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把自己打造成党和政府的智囊团。这是它安身立命的价值所在，任何一种脱离了社会现实和应用的社会科学都是没有作为、没有生命力的。

辽宁社会科学院起步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 1962 年，其前身是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迅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之后，进而蔚为大观。五十春秋，筚路蓝缕，薪火传承，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奉献了弥足珍

贵的学术成果，并作为辽宁省委、省政府的智囊团，为推动辽宁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文化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并在此过程中，造就了一支学有专攻、术有所长的学者队伍，涌现出一批学术精英人才。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的“十一五”时期为例。辽宁社会科学院共完成学术成果 3500 项，出版著作 104 部，发表论文、研究报告 3266 篇，有 236 项成果获胡锦涛、李长春、刘云山等国家领导人及省部级领导批示，总字数达 5056 万字。诸多成果不仅显示了特有的学术价值，而且被转化为新政策、新举措付诸实施，带来可观的社会经济效益。有关专家成为辽宁省重点学科——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经济、金融学、社会学、民俗学、中国语言文学、东北边疆史地史、明清史、东北近现代史、区域经济学的学术带头人。

列入首批“辽宁社会科学院学者文库”著作的作者，均为国务院批准的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他们在各自研究领域勤奋钻研，成为享有盛誉、颇具建树的知名学者。将他们的成果结集出版，对于积淀学术文化、加深学术积累、典藏学术精品乃至传承中国学术传统、打造具有地域风格和特征的学术流派、彰显辽宁社会科学院学术风范，无不具有重大意义。在这支“学者文库”作者队伍中，未来无疑还将有更多的加盟者。

展望未来，刚刚踏入“十二五”时期的辽宁社会科学院，志在通过五年的努力，建成体制完善、机制灵活、人才聚集、学科布局合理、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在国内位居上游水平、在辽宁省内具有权威地位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研究机构，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研究和传播中心、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战略咨询服务中心、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和信息交流中心、地方党委与政府名副其实的思想库和智囊团。

辽宁社会科学院因时而生，为民而谋；孜孜以求，唯兴国以为宏志。共襄五秩盛典，无不鼓舞欢欣，豪情满怀。往事可追，前程在望。感慨系之，谨以为序。

纪世英

2012年7月8日

序 一

武 斌*

不久前，张卓民先生来电话说，他的学术文集即将出版了，嘱我写一篇序言。随后，又将他的文集的电子版给我发过来。我听到张先生文集要出版的消息，感到很高兴，也很愉快地接受了写序的任务。最近几年，我为几位老先生如彭定安、牟心海、张玉兴等人的文集或著作写序。本来，后辈为前辈学者写序，是不太合适的，因为“序”这种文体，一般都是前辈为后辈的作品写的，有对作品本身价值的评论和肯定，也有鼓励、奖掖的意思。这两层意思，我都不敢当，所以由我来写，就颇有“冒犯”长辈的意味。但我体会，我为这些老先生写序的过程，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虽然这些前辈我都很熟悉，都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但既要写序，就要把他们的论著再读一遍，至少是要比较认真地浏览一遍，这本身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过程。另外，对于张卓民先生，我觉得也有许多话要说，就借这个机会来谈一谈吧。

我和张卓民先生相识已经有 30 多年的时间了。1982 年初，我从南开大学毕业，就开始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当时，哲学研究所有两个相对独立的研究室，我在哲学研究室，张卓民先生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室。那个时候，正赶上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初期，哲学社会科学处于大发展的良好态势，各个学科都很活跃，而我们院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室聚集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如傅世侠、张卓民、王树茂、马成立、康荣平等，他们在学术界都很活跃，他们的心理学、科学哲学、自然辩证法等方面的研究在全国同行中处于领先地位。正是从那个时候起，我和张卓民先生逐渐地熟悉起来。我很钦佩他们的学术水平和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不时

* 武斌，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研究员。



就一些学术问题向他们请教。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我得到张先生很多的关心和指导，也成为忘年交。我们曾一起参加国情调查的研究，一起主持“分析与预测”的研究课题。特别是张卓民先生主编《选择学丛书》，邀我加盟，并对我的写作给予了很多的指导和帮助。我对自己比较满意的事情是有很多好朋友，特别是与一些老同志做朋友，他们的友情、关怀、鼓励和支持，是我成长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心理动力。由于工作岗位的关系，张卓民先生是他们当中来往最密切，给我的帮助、鼓励和支持最多的人之一。

张卓民先生的学问和学术成果，我觉得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主要是从事自然辩证法、科学哲学的研究，可以说是在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第二个阶段是在 90 年代以后，主要是从事国情调查和辽宁省情分析与研究，可以说是在社会发展前沿的社会学探索。这样的区分只是大体而论，但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学术发展思路和主要成就。收集在这本文集中的主要是前一部分成果，后一部分有几篇比较重要的文章也被收录进来，更多的成就反映在他主持的十几本大规模的国情调查丛书和辽宁省经济社会发展分析与预测系列丛书里。所以，我觉得要用一句话来概括张先生的学术研究的特点，就是他始终行走在科学与社会探索的前沿，并且，他是一个很勤奋、很严肃和很有成就的探索者。

自然辩证法研究，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初就很活跃并且发展迅速的一个学术研究领域。“自然辩证法”这个概念，简单地说，是指关于科学和自然史的方法论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的世界观时，认为整个世界的历史可以“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对这两方面的历史的哲学概括即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两门学科，即“自然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自然辩证法”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哲学、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不仅具有哲学属性，而且具有交叉学科的性质。在我国学术界，自然辩证法首先是作为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和自然科学观受到重视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20 世纪 70 年代末，有关科学问题的哲学讨论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1978 年 1 月，由著名科学家周培强、钱三强、于光远发起，经邓小平同志批准，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然辩证法”研究从此成为一门显学。当时，辽宁社会科学院刚刚建立不久，傅世侠、张卓民等同志敏锐地把握这个新的发展态

势，率先在辽宁组织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果，在全国的同行中都很有影响。他们组织编写的《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一书，从当时发展最为突出的几大科学领域的前沿性研究，探讨其中的哲学和方法论问题，提出了许多在当时有突破性的见解和思考。在这一时期，张卓民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有研究深度的论文，集中讨论有关科学方法论的问题。后来，他又主编了《科学方法论丛书》，系统地介绍现代西方哲学中有关科学方法论的最新研究成果。其中他写作的《系统方法》对现代西方发展起来的系统论思想进行了比较充分的研究，是当时我国有关系统论研究中比较早的论著之一。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新科技革命迅猛发展，对世界各国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科技体制改革也全面展开，科学技术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少学者开始把现代科学技术当做一种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加以研究。在这样的条件下，张卓民先生又积极关注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特别是新科技革命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的研究，写出了有启发价值的论文，并且在一些学术会议和政府咨询论证会上积极呼吁，希望引起全社会对相关问题的关注，并采取积极的对策，抓住有利的发展机遇。这些论文和建议在当时都有不小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初期，张卓民先生率先提出了关于“选择学”的研究，并组织不同学科的一些专家学者开展合作，完成了《选择学丛书》。陈昌曙、彭定安等省内学术大家都积极响应，参加到对选择学的研究中来，我的选题“人格选择学”也有幸被张先生选中。张卓民和宋曙合作的《一般选择学》对“选择”问题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是一项很有开创性的成果。

张卓民先生所从事的自然辩证法或科学哲学研究，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学术领域，他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很突出的。但是，张先生并不是单纯沉湎于书斋的学者，而是一个积极关注社会生活发展的、具有经世情怀的现代知识分子。所以，一方面，他潜心在学术的领域里，另一方面又积极地关注中国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关注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针对这些问题和情况，作出一个学者的思考。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出现了大发展的态势，同时也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变革。在这种情况下，加强对国情的研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这个项目。这是一个相当大的项目，需要组织全国为数众多的专家学者参与。辽宁省的这个项目就是由张卓民先生负责的。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发



生了一个重要的转向，即转向对现代化过程中社会发展问题的关注，对社会发展进行社会学的探索。当时，我也参加了张先生组织的营口和抚顺调查项目。从那时起，持续几年的国情调查，张先生不仅主持完成了“中国百县市经济社会调查”的营口卷、抚顺卷、彰武卷、海城卷等，还继续进行跟踪调查，进而主编了《改革开放 20 年的理论与实践·辽宁卷》《辽宁五十年成就事典（科技部分）》《历史性的巨变——解读辽宁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伟大实践》等著作，对于深入认识辽宁省情，深入认识辽宁省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亟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有着重要的价值，同时也给党和政府的决策提供了学术性的科学依据。大约是在 1994 年秋天，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进行经济社会分析预测的研究项目（即所谓“蓝皮书”）。我在报纸上看到这个消息后，就和张先生议论这件事，觉得我们也应该进行这样的研究，于是在省政府领导的支持下，这个项目很快就做起来了。正是在张卓民先生的主持下，从 1995 年 1 月出版《1994～1995 年辽宁省经济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开始，这个项目一直坚持了十几年，到现在已经成为辽宁社会科学院的一大品牌工程。后来，张先生还主持了沈阳市的“蓝皮书”工程。实际上，说到辽宁的“蓝皮书”，不论辽宁社会科学院的领导班子发生了什么变动，不论参加这个项目的队伍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始终都是张先生在一线指挥和组织的。辽宁的“蓝皮书”实际上是和张卓民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

在组织国情调查和“蓝皮书”的项目时，张卓民先生不仅是直接的组织者，并且亲自动手，写作了其中的重要篇章，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很多青年学者，带出来一支很好的队伍。由于这两个项目工程巨大，牵涉到许多学科的专业，所以辽宁社会科学院领导决定从全院的相关研究所抽调力量，其中涉及经济所、哲学所、社会学所、历史所、文学所等好几个研究所，而且其中大部分是青年学者。张先生在组织工作中，不仅担负着争取经费支持、谋划布局、调查研究、统筹定稿以及最后出版等具体工作，更主要的是带队伍。和许多学问大家一样，张先生对于后辈青年都充满了关心和爱护，实际上，辽宁社会科学院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得到过张先生的帮助和指导。而这一切，在张先生看来，都是很自然的，是自己所应该承担的职责。现在，张先生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仍然坚持在科研的第一线，仍然在主持“蓝皮书”的工作，这不仅是对于这项事业的责任，更重要的是对于培养青年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说到张卓民先生对于后辈学者的关心和帮助，我是很有切身体会的。前面说到，我曾和张先生一起共事多年，除了学术上的关心和指导之外，在这多年的合作中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2004年，我被调任沈阳故宫博物院担任院长职务，张先生不太愿意我离开。我理解张先生的心情，毕竟在一起长达二十多年，并且是十分密切的好朋友。更主要的是，他认为，我的优势和长处在于学术研究，行政管理并不是我的长处。如果因为行政工作耽误了研究和写作的学术事业，是很可惜的。这也是许多老同志对我的看法。然君命难违，在沈阳故宫博物院工作的这些年，虽然工作繁忙，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学术事业的追求，没有放弃研究和写作。我这样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想，不能辜负像彭定安、张卓民等老前辈、老朋友的期望。他们的期望和友情，一直给我的成长很大的鼓励。以后，仍然如此。

在本文集即将出版的时候，我写了上面的这些话，权以为序，也是对张先生学术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祝贺。

2011年5月6日

序 二

王 前*

作为哲学一级学科下面的二级学科之一，“科学技术哲学”同时也称“自然辩证法”，这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学科演变的产物。在1986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公布学科名称时，将这两个名称以加括弧的方式并列，是颇费一番心思的。因为在此之前，自然辩证法研究经历了一个从意识形态工具向学科演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许多学界前辈都作出了重要贡献。回顾这段历史，对于了解和发扬自然辩证法研究的学术传统，更好地实践“为国服务”的宗旨，具有重要意义。辽宁社会科学院张卓民研究员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学术研究，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例。下面尝试以此为例，作一学科史的回溯性研究。

在改革开放之前，自然辩证法研究具有明显的意识形态工具的特征。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上半期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重点是探讨自然科学和技术发展中的哲学问题，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对科技工作者的影响。在“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自然科学和技术领域的表现，成为给自然辩证法研究规定的政治任务。这种思想倾向使自然辩证法研究偏离了正确轨道，冲击了科学技术研究的正常秩序。改革开放之后，在“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自然辩证法工作者重新思考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关系，强调哲学只能指导而不能代替或冲击科学研究，在清除“代替论”的消极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尽管如此，这方面研究仍然带有意识形态工具的特征。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些高校开始招收自然辩证法专业研究生，有的高校还办了本科师资班，但自然辩证法研究作为学科的属性还是不够明显。

* 王前，大连理工大学哲学系，博士生导师。

促使自然辩证法形成学科体系，关键在于研究方式的转变。这种转变决定了学科的定位、任务和特征。张卓民先生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的学术研究，从三个方面展现了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

其一，由用哲学原理解释和评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转变为从自然科学新成果中提炼新的哲学问题，发展和完善哲学原理。如果仅仅局限于用哲学原理解释和评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意味着已有的哲学原理是不容置疑的，而解释和评价自然科学研究成果只是哲学原理的一种应用，这是作为意识形态工具才有的特征。从自然科学研究新成果中提炼新的哲学问题，发展和完善哲学原理，意味着哲学原理与时俱进的变化，这才是学科发展应有的特征。

张卓民先生这一时期的研究工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

关于“物质无限可分”问题的研究。由于物理学中“夸克幽闭”理论的出现，有些学者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关于“物质无限可分”的观点不再成立。在《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①一书及其他一些文章中，张卓民先生指出，要区分物质世界的“分割”与“可分”，前者只是后者的一种特定情况。“可分”指的是事物内部存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部分或要素，它们各有其特殊性质，能够为我们所认识和研究。即使不能分割成独立存在的部分，仍然是“可分”的。这一表述后来为很多教材和工具书采用。

关于系统哲学的研究。在《系统方法》一书和《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②等文章中，张卓民先生首次将“系统”与“要素”作为哲学范畴加以阐发，认为应该将系统观作为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组成部分，并指出系统方法是唯物辩证法的补充和深化。这些思想成果开启了系统哲学研究的先河，至今系统哲学仍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的热点领域。

关于爱因斯坦哲学思想的研究。在《略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③一文中，张卓民先生通过具体分析爱因斯坦的科学成就，认为爱因斯坦作为伟大的科学家，具有自觉的唯物主义和明确的朴素辩证法思想，这是他取得重大科学成就的哲学思想基础。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后期“批判”爱因斯坦的闹剧所作的一次相当透彻的学术清理，对于从学科角度理解自然

① 张卓民：《科学前沿的哲学探索》，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

② 张卓民：《辩证唯物主义系统观初探》，《社会科学辑刊》1983 年第 6 期。

③ 张卓民：《略论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1979 年 3 月 6 日《辽宁日报》。



科学家的哲学倾向具有重要意义。

其二，由对西方科学哲学流派的简单批判，转变为客观评价和辩证分析，从中吸取合理的思想成分。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对所有西方科学哲学流派都采取彻底否定和排斥的态度。而作为学科研究，则需要通过辩证地分析，揭示西方科学哲学流派的时代背景、合理成分和历史局限性，使这种研究有益于自然辩证法学科自身的发展。正是由于开展了这方面研究，自然辩证法研究才开始同西方的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研究开展对话与交流，并有了“科学技术哲学”这样一个学科称谓。

张卓民先生在这一时期，主要开展了对英国哲学家波普的“世界三”理论的研究。在《波普的“世界1·2·3”理论评介》^①一文中，他在指出波普理论存在的唯心主义倾向的同时，也指出了其中的合理思想成分，如“物质”与“精神”之间存在“第三态”的合理性、脑—意识相互作用理论的合理性、知识增长规律尤其是“证伪”的合理性，等等。他特别提到，在哲学认识论面临新挑战的时候，提出新观点、新理论的精神是值得赞赏的，应该批判地吸收波普理论中的合理因素。这种声音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是很难听到的。

其三，从对自然辩证法经典著作的阐释和评注，转变为在总结相关领域研究成果基础上的理论建构和创新。自然辩证法研究要体现在当代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和生命力，关键在于理论创新，为解决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提供智力支持。这是一个学科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张卓民先生在这一时期，主要开展了选择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在他的专著《一般选择学》^②以及其他相关论文中，他指出，选择是当今多样性社会最显著的特点。借助系统科学特别是自组织理论、多世界理论和或然性理论，以及决策科学和管理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他提出了“选择学”的理论框架，对选择的原则、规律和方法作了详细阐述。在此基础上，他还开展了对思维方式及其社会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工作更加贴近现实问题，使自然辩证法研究逐渐同管理科学、决策科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张卓民先生的这种研究方式的转变和取得的成果，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很多学界前辈研究活动的一个缩影。这些学界前辈在那个时代的

^① 张卓民：《波普的“世界1·2·3”理论评介》，《哲学研究》1981年第2期。

^② 张卓民：《一般选择学》，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

研究成果，现在许多内容已经为人们熟知，有些已经写入相关的教科书中。由于现在的年青一代从一开始就把这些内容作为现成的东西接受下来，所以可能觉得没什么了不得。但是从学科史角度看，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思想转变仍然是值得关注的。从意识形态工具向学科的转变，在当时需要相当的理论勇气和智慧，这一点现在的年青一代可能体会不到。可是如果没有这些学术前辈的努力，自然辩证法，或者说科学技术哲学这个学科，是不会发展到今天这个程度的。通过回顾自然辩证法学科形成的历史，才能对学界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有更全面的认识，这种学科史的梳理工作应该更广泛地展开。

回顾学科史还会带来对现实的启发。在今天仍然需要引起反思的是，在贯彻“为国服务”的宗旨的时候，我们应该立足于通过发展学科，体现学科优势，来为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意识形态工具的层次上，简单地从事为某些政策做“注释”、做宣讲的工作。作为哲学分支的自然辩证法或者说科学技术哲学，其本性是反思，是立足于深厚理论底蕴的深入思考，需要发现问题，揭示问题形成的症结所在，然后才有可能提供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良策。